

## 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 会影响区域经济吗？

高翔 龙小宁\*

**摘要** 现行“省制”一级行政区划打破了区域文化分布，造成很多地区被分割出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而划分到其他省之中。这些被分割地区与本省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冲突，与持相同文化的邻省之间又被设置了地方保护壁垒，无论与哪一方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交易成本都会更高，从而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本文以大类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这种文化分割所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确实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重，随被分割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的延长而减轻，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乱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 文化分割，区域经济，方言

**DOI:** 10.13821/j.cnki.ceq.2016.01.10

### 一、引言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迥异，再加上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关东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语言、风俗传统、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现行省级行政区划没有很好地考虑这种文化差异，经常出现属于同一区域文化的地区被分割到两个甚至多个省份的情况。比如，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与浙江省同属于吴越文化，使用的方言都是吴语，却被划入江苏省；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基本上与河南、山东西部同属于中原文化，却被行政区划分割开来；徽文化的主体在皖南，而属于徽文化的婺源县被划入了江西省，淳安、建德两县(市)长期属于

\* 高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龙小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龙小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22 号厦门大学经济楼，361005；电话：(0592)2182075；E-mail: cxlong@xmu.edu.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732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720151001)、“长江学者”科研配套经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015A030310476)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项目(GWTP-BS-2015-05)的科研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有益评论和建议。文中仍可能存在的错误由作者负责。

浙江省。一般来说,在每个省中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持有的文化可以被认为是该省的主流文化,而其他被分割出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划入到这个省的地区所持有的文化则可能与该省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主要经济形态是小农经济或者是政府干预很少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时,省级行政区划对文化布局的分割以及由此带来的省内文化差异并不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的古代,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很少,人们之间的交往主要限于本府(州),甚至本县范围内,省级行政区对区域文化的分割不会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而当经济体是一个发达的完全由个体决策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时,各经济参与人可以完全依据市场规则在各个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指导下进行最优决策,属于相同区域文化的地区拥有相同或类似的风俗习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相互间更容易产生信任,因此交易成本更小,可以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是否隶属于同一省级行政区并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虽然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已经主要是由市场价格力量支配资源配置,但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级政府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体制虽然可以刺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并获得了高速的GDP增长(Qian and Roland, 1998),但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各地出于经济和财政利益(沈立人和戴园晨, 1990<sup>1</sup>),政治晋升(周黎安, 2007<sup>2</sup>)等原因纷纷进行激烈的经济竞赛,通过经济、行政、司法等各种渠道制造省际贸易壁垒(Bai *et al.*, 2008; 龙小宁和王俊, 2014<sup>3</sup>),甚至不惜以两败俱伤的方式谋求本省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周黎安, 2004<sup>4</sup>),并由此产生了地方保护、区域市场分割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省级行政区划对地方文化的分割就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方面,被分割出自己所属区域文化的地区与本省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非正式制度冲突和不信任都会增加经济交往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被分割城市与持相同文化的邻省其他城市之间又因为属于不同的省份而面临各类分割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因此无论与哪一方进行经济贸易合作,贸易成本都会更高。而贸易机会和经济合作减少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些地区不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分

<sup>1</sup> 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第12—19页。

<sup>2</sup>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

<sup>3</sup> 龙小宁、王俊,“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基于知识产权案例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14年第3期,第3—18页。

<sup>4</sup>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第33—40页。

工和专业化水平更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并检验下面的命题：省级行政区划对地方文化的分割所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与邻省地方保护相结合会使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其他地区。以大类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我们发现省内文化差异确实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控制其他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均GDP比其他城市平均约低15%，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重，随被分割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的延长而减轻，支持了文化分割与地方保护相结合损害区域经济发展的假说。

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研究中，国际间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Hofstede, 1980; Park and Ungson, 1997; Mezias *et al.*, 2002; Guiso *et al.*, 2009)，其中也不乏关于中外文化距离对中国外资及合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Luo and Peng, 1999; Li *et al.*, 2001; 潘镇等, 2008<sup>5</sup>)。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中国内部文化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sup>6</sup>在地方保护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从经济和财政分权(沈立人和戴园晨, 1990)、产权制度(张维迎和马捷, 1999<sup>7</sup>)和政治晋升(周黎安, 2004)等角度解释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原因，也有大量实证文献研究了中国各地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程度、趋势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影响(Young, 2000; Poncet, 2003, 2005; 陆铭和陈钊, 2009<sup>8</sup>; 高翔, 2014<sup>9</sup>)。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是以省为研究对象，并且更多的是关注每个省的地方保护水平对自身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邻省地方保护对本省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特别是邻省地方保护对不属于本省主流文化的被分割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虽然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和地方自主权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问题已有大量文献(史宇鹏和周黎安, 2007<sup>10</sup>; 王贤彬和聂海峰, 2010<sup>11</sup>; Law等, 2015<sup>12</sup>)，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文化在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另外，很多经济地理文献中

<sup>5</sup> 潘镇、殷华方、鲁明泓，“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第103—115页。

<sup>6</sup> Gong *et al.* (2011) 讨论了中国方言和文化多样性对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匹配质量的影响，但没有实证支持。

<sup>7</sup> 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第11—20页。

<sup>8</sup>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第42—52页。

<sup>9</sup> 高翔，“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中‘公地的悲剧’——基于我国主要湖泊和水库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14年第4期，第21—29页。

<sup>10</sup> 史宇鹏、周黎安，“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市为例”，《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第17—28页。

<sup>11</sup> 王贤彬、聂海峰，“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第42—53页。

<sup>12</sup> Law、李云森、龙小宁，“城市经济自主权和城市规模扩张——以中国的计划单列市政策为例”，工作论文，2015。

关于行政区划的研究(刘君德等, 1999<sup>13</sup>; 金太军, 2003<sup>14</sup>; 金太军和汪漫艳, 2006<sup>15</sup>)明确指出了省级行政区划打破人文地理单元造成“犬牙交错”等妨碍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 但是这些研究仅限于理论陈述, 缺乏实证依据, 而本文研究被分割地区受省内文化差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以及在邻省不同的地方保护水平下行政区划打乱区域文化分布的影响, 从而可以对这些文献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文章接下来部分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来讨论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描述我国省内文化差异形成的历史原因并介绍本文中文化差异的度量指标; 第四部分提出本文将要检验的理论假说, 并阐述将要使用的计量模型以及实证检验将使用的数据; 第五部分则报告实证结果, 并进行有关机制和其他可能解释的讨论; 第六部分给出简短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 二、文化距离与交易成本: 文献评述

分工和交易是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 巨额跨地区和跨国的贸易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工能否深化, 交易能否扩大都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 这时文化的异同就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文化相同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信任, 从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和生产率的提高; 相反, 文化之间的冲突则可能增加交易成本进而阻碍专业化水平的深化和经济的增长。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化概念。本文使用的是一个较狭义的文化概念, 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比较接近 North(1990)提出的非正式制度的内容。North(1990)在分析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指各类成文的法律、法规, 而非正式制度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内容。正式制度往往是对非正式制度中得到普遍接受和遵守的部分通过文字进行强化, 只有与非正式制度一致的正式制度才能得到较好的实施, 而非正式制度冲突的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往往是非常高昂的, 因此在社会经济中对人们的行为起主要约束作用的是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

文化影响交易成本和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对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影响。相互信任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 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Knack and Keefer, 1997; Paxton, 1999)。Delhey and Newton (2005) 指出影响社会

<sup>13</sup> 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中国政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sup>14</sup> 金太军,《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sup>15</sup> 金太军、汪漫艳,“现行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思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15页。

信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距离，而社会分化一般都伴随着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种族多样性会降低社会信任的水平(Knack and Keefer, 1997; Zak and Knack, 2001; Knack, 2003; Zerfu *et al.*, 2009)。虽然绝大部分生活在我们样本中的地区的居民都是汉族，但是不同地方文化的人群往往具有相互不同的方言、习俗、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所有这些特征的差别都有可能产生社会分化，降低省内不同文化地区之间社会信任的水平。王茂福等(1999)<sup>16</sup>研究了远距离跨区域文化的水库移民与当地居民文化冲突的问题，发现移民与当地居民在方言、耕作方式、饮食习惯、婚丧风俗、民间文艺等诸多文化元素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严重影响了水库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并经常引发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还导致很多移民放弃国家补偿回迁故乡。所以作为非正式制度冲突的文化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降低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对于每个省的不同地区而言，文化相同或相似的人群之间的信任水平更高，而属于不同区域文化的地区之间的信任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都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Axelrod, 1984; Gambetta, 1988; Ostrom and Walker, 2003)。使用实验方法，Büchner *et al.* (2004)发现在诱导需要合作并支付成本的行动中信任可以起到和激励契约同样好的作用。Bjørnskov (2009)还发现社会信任能够降低聘用高教育水平人员时的交易成本。Guiso *et al.* (200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衡量欧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研究发现共同的文化基础可以有效地加深两国人民之间互相信任的水平，并且信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在管理学领域，Hofstede (1980)开创性地从权利距离、不确定性厌恶程度、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和性别角色差异这四个维度测量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从而使衡量国家间文化差异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Barkema *et al.* (1996)研究了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寿命的影响，发现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大的外资企业更有可能撤资或者解体。另外，在对中国外资企业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无论是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差别还是作为非正式制度冲突的文化差异，制度距离都对外资企业的绩效具有重要影响(Luo and Peng, 1999; 潘镇等, 2008)。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化相同和类似的人们之间信任水平更高，进行贸易和交易的交易成本更低，从而有利于经济交往和发展。

下文中我们将以中国各地区为例，为文化的异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实证依据。具体来说，我们探讨中国各省中的文化分割地区与本省其他地区在文化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是否会导致相互之间的信任水平更低而交易成

<sup>16</sup> 王茂福、黄勤、丁力先，“区域文化差异对远迁水库移民返迁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1期，第43—47页。

本更高,并进一步造成这些地区面临更高的省内贸易成本。<sup>17</sup>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先介绍中国省内文化差异的形成与度量指标,之后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将讨论实证研究的数据、方法和结果。

### 三、中国省内文化差异的形成和度量

在唐朝以前我国行政体系主要实行郡(州)县两级制,由于郡(州)的数量过多,管理幅度过大,唐朝时开始尝试实际的三级管理体制。唐朝按长江、黄河、秦岭、剑阁等主要山川河流地理屏障将全国分为10—15个“道”,这种划分思路尽可能保证了同一区域文化归属同一道。北宋在唐朝15“道”基础上继续细分,将其所统治的范围划分成24个“路”,而同一历史时期的辽国也按同样逻辑将其统治区域划分为若干个“道”,这一思路进而被后来的南宋和金政权沿袭。因为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天然地理屏障间的密切联系(李德勤,1995<sup>18</sup>),使用这种划分思路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一级政区内只有一种区域文化或者每种区域文化都只在一个一级政区内<sup>19</sup>,但导致的文化分割情况很少。比如,按照这种思路属于巴蜀文化的现代陕南地区的汉中和安康不会被划分到陕西省,而属于中原文化的现代安徽和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区也不会与长江以南的地区属于同一个省,因此一级政区内文化差异比较有限。

但是到了元朝,出于蒙古中央统治集团对地方凭险割据对抗中央的担忧,一级政区的划分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以天然地理屏障为标准来划分一级政区“行省”,而是每个“行省”内部都横跨一个或数个大型山脉或河流。如魏源《圣武记》中所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元代省的设立立意在于‘镇抚’而非‘牧民’,省乃行政性的军区。”<sup>20</sup>明朝的一级政区“布政使司”对元朝的“行省”进行了细分,但打破地理单元和区域文化分布的思路没有改变。这种划分省级行政区划的方法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区域文化被分割到两个甚至多个省之中,如中原文化被分割到河南、安徽北部和山东西部,江淮文化被分割到江苏北部、安徽中部以及湖北东部。

也许是此后历代统治者都认为这种划分思路对政权稳定有好处,或者是路径依赖的因素,明朝行政区划经过清朝、“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现在,除

<sup>17</sup> 关于制度、信任、交易成本和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 Beugelsdijk and Maseland (2011), Alesina and Giuliano (2014)。

<sup>18</sup> 李德勤,《中国区域文化》。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5年。

<sup>19</sup> 比如在北宋时期,江南东路中既有客赣文化也有徽文化,而晋文化也分布在河东路、河北西路和京西北路三个一级行政区之中。

<sup>20</sup> 转引自谢宝富和武洋(2004)。谢宝富、武洋,“当代中国行政区划若干问题分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3—17页。

名称改变和个别地区的调整外，基本思路和格局没有再进行过重大改革，使得很多地区被分割出了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而划分到了其他省之中。不管是因为哪些因素导致的这种继承，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划分省级行政区划时是极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因此一个省内各地区的文化差异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而一个地区与所在省的主流文化是否相异也与该地区的经济状况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鉴于很难找到某个文化的具体影响范围，为了度量文化及其差异以进行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我们没有直接去度量每个城市所属的地方文化，而是用其所使用的大类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sup>21</sup>，这样做一来是因为中国各地不同的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区域文化中最显性和最易被感觉并观测到的特征，二来是因为在方言研究文献中有细分到县甚至更小范围的方言分布记录。关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依据。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研究中关于中国区域文化和方言的划分暂时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方法，但不同学者的划分基本上是高度类似的，不同划分之间的细节差异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主要是从中借鉴得到普遍接受的一般划分方法，并且探讨方言能否成为区域文化的合适代理变量。综合李德勤(1995)、陈金川(1998)<sup>22</sup>、王恩涌(2008)<sup>23</sup>、朱建颂(2008)<sup>24</sup>等文献，汉文化内部主要的区域文化有关东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甘陇文化、徽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江准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八桂文化、客赣文化和闽台文化。而根据詹伯慧(1991)<sup>25</sup>、詹伯慧(2002)<sup>26</sup>、周振鹤和游汝杰(1986)<sup>27</sup>、颜逸明(1994)<sup>28</sup>等语言文献，汉语内部的大类方言主要有东北官话、北京官话、晋语、北方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徽语、西南官话、江准官话、湘语、吴语、粤语、平话、赣语、客家话和闽语。从以上区域文化和汉语方言的分类可以看出，二者虽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但至少是高度相关的，不少文献都是同时研究方言和文化，并且很多区域文化研究文献在描述某个区域文化的影响范围时直接借用该区域文化的方言的使用范围，道理很简单，因为方言是文化内容中最容易直接观察和度量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本文也使用大类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每个

<sup>21</sup> 汉语方言的分类法中一级为“大类方言”，二级为“片”，三级为“小片”，“大类方言”的使用范围与区域文化的范围大致相当，而“片”和“小片”的范围过小，不适合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

<sup>22</sup> 陈金川，《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

<sup>23</sup> 王恩涌，《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sup>24</sup> 朱建颂，《方言与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sup>25</sup> 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sup>26</sup> 詹伯慧，“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方言》，2002年第4期，第344—352页。

<sup>27</sup>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sup>28</sup> 颜逸明，《吴语概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城市所属的区域文化被界定为该省的主流文化,然后针对每个地级城市定义一个虚拟变量:与省会文化是否不同。具体而言,将每个城市所使用的方言与省会使用的方言进行对比,如果二者属于不同的大类方言则该虚拟变量的变量值设为1,表示该城市与所在省的主流文化存在差异;若二者属于同一个大类则设为0,表示该城市与所在省的主流文化没有差异<sup>29</sup>。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使用的是中原官话,而黄河以北四个城市焦作、新乡、安阳和鹤壁则主要使用晋语,因此我们将这四个城市定义为与河南省主流文化不同,文化差异虚拟变量取值为1,相应地该变量在河南省其他城市取值为0。

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潜在问题是文化的差异在地域上往往是渐变而不是突变的,两地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相同或不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福建省,闽语和闽台文化的特点是内部差异非常大,如闽东话、莆仙话和闽南话之间通话难度很大,而西南部的龙岩市大部分地区使用客家话,但市区闽南话也很普及,使用大类方言来度量时则只能假设福建省除龙岩外文化是一样的,而龙岩被界定为与福建主流文化不同。这样的假设显然存在不合理性,但由于对渐变的文化差异的具体量化很难或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近似测度。测度误差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种测度误差在模型中是随机外生的,既不与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分割,即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存在必然相关性,也不与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在理论上有任何必然的相关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完全随机且外生的干扰因素。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不相关的解释变量测度误差只会使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存在向零偏误,因此我们估计出的系数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差异影响的下限。如果使用这种测度依然发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那么使用更精确的度量只会发现更大的作用。

#### 四、理论假说、模型和数据

相对于生活在同一文化中的人群,持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会存在很多差异,而不同文化人群间培养互相信任的难度也更大,这些差异和不信任就会提高交易成本并阻碍贸易的进行。我们按与所在省主流文化是否相同将所有中国城市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关注的与本省主流文化不同而与邻省文化相同的被分割城市,也即计量分析中的处理组,另一类是属于本省主流文化的城市,也即参照组或控制组。如果地方保护主义壁垒限制了省际贸易,文化差异就会对第一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

<sup>29</sup> 省会城市本身不在研究样本内。

生负面作用。而对于第二类地区，这种地方保护与文化差异的结合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正面作用，因为它们本来就主要与省内城市进行贸易交往，地方保护的负面作用较少，而省内与本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城市在面临省际地方保护的壁垒时又被迫与这些主流文化地区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因此主流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从中受益，至少文化差异不会对它们产生负面作用。由此可以得出

假说：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所持文化与本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低于主流文化地区。

由于各种原因，每个省的地方保护水平是不同的，如果邻省地方保护主义较弱，那么被分割的城市与持有相同文化的邻省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就不会被提高太多，可以预期文化差异的作用也会相应减少。相反，如果邻省地方保护水平非常高，限制了大部分潜在可能的省际贸易，每个城市都只能主要与本省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合作，那么与本省主流文化是否相同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文化差异的作用也会更明显。从而可以得出

推论1：文化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将随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提高而加重。

另外，虽然元朝划分行政区的整体思路一直延续至今，明朝之后行政区划总体格局的变化不大，但是小范围的调整还是不少。因此不管是与本省主流文化相同还是不同的地区，它们与自己现在的省会属同一省级行政区的历史长度都是存在差异的。相对于其他省的城市，属于同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多，特别是与省会之间的交往，即使是文化不同的地区之间也是如此。虽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进要比成文法律等正式制度的演进慢得多(North, 1991; Roland, 2004)，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长度也足以起到文化逐步同化的作用。因此被分割的地区如果被划入当前省份的时间很长，那么历史长度所产生的文化同化可以减轻省内文化异质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即文化差异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新近被分割的地区中。所以有

推论2：文化差异对被分割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随它们与当前省会属于同一行政区历史的延长而减轻。

为了从实证角度分析省内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检验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横截面数据模型：

$$\ln(\text{pgdp})_i = \alpha_0 + \alpha_1 \text{culture}_i + X_i' \beta + \epsilon_i,$$

其中  $i$  表示观测点即城市，本文的研究范围是 249 个普通地级城市，也即从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剔除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因为这些城市拥有很多其他城市没有的各种经济、财政、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自主权和其他不可观测的发展优势，与其他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可比性较小。

另外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和海南在剔除省会(首府)之后就只剩一个或没有地级市,难以比较省内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依据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文献的做法,我们使用每个城市市辖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ln \text{p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当地的经济水平。之所以选择市辖区而不是全市范围是因为文化差异影响的主要是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影响较少,而每个城市全市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的差别很大,用全市人均GDP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使用2009年和2010年两年各城市市辖区人均GDP的平均值以减轻特定年份的测度误差和随机冲击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核心解释变量 *culture* 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每个城市所属区域文化是否与该省主流文化不同,用该城市方言与省会方言是否不同来代理。在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有约29%,即72个城市使用的方言与省会使用的方言不同,而与邻省其他城市使用的方言相同。按照我们的研究假设,这些城市被定义为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也即被分割出了自己原本所属的区域文化。由于省级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破是从政治角度人为进行的,基本没有考虑经济发展因素,所以排除新疆、西藏、青海和海南之后,这些被分割城市的分布是相当分散和均匀的,没有集中分布在某个区域<sup>30</sup>。当然,方言也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外生变量,除了来自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方言分布还受到战争、移民、地理等因素的重要影响。但是在我们看来,方言及其所代理的地方文化的分布与当代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地方文化和方言的研究专家认为中国当前的方言分布是在宋代形成的,之后的方言分布变动很小。第二,省级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破是从政治角度人为进行的,基本没有考虑经济发展因素,暂时没有发现文献记录表明中央政府故意将某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划入持有不同地方文化的邻省,相反,关于中央政府从政治稳定、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角度论述行政区划变革的记录却很多。第三,本文使用的方言调查数据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完成的,相对于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较强的外生性<sup>31</sup>。综合对方言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行政区划思路的变迁和图形分布的分析,可以认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culture* 与各地区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因此本章的实证分析不存在严重的逆因果问题。

<sup>30</sup> 被分割城市确实更多地分布在离省会较远的省界附近,但是我们同时控制了距省会直线距离和省界虚拟变量,在控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之后距省会直线距离显著为正,省界虚拟变量也为正,并且不显著。也即只有距最近大城市的距离(该变量显著为负)会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显著负面的影响,在控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之后本文没有发现距省会直线距离和位于省界会不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

<sup>31</sup> 另外,本文还发现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更强或者新近被划入当前省份的非主流文化城市受文化分割的负面影响更大,如果方言分布是由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内生决定的,我们应该不会发现这两个影响机制。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人均 GDP 对数	249	10.383	0.585	8.697	12.119
culture	不属于主流文化	249	0.289	0.454	0	1
protection	邻省地方保护指数	249	0.035	0.017	0.012	0.088
history length	划入当前省历史长度	249	772.221	302.391	61	1049
seaport	海港城市	249	0.092	0.290	0	1
riverport	长江港口城市	249	0.060	0.238	0	1
Indisbigport	距最近大海港直线距离对数	249	5.834	1.151	2.303	7.393
Indiscapital	距省会直线距离对数	249	5.074	0.673	2.485	7.025
rail	铁路个数	249	2.554	1.231	0	6
nationroad	国道个数	249	2.506	1.283	0	7
highway	高速公路个数	249	2.992	1.437	0	9
Indisbigcity	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	249	4.939	0.599	2.944	6.458
lnpdninvest	人均国内非房地产投资对数	249	9.729	0.581	8.034	11.461
lnpdninvest	人均国内非住宅投资对数	249	9.789	0.580	8.133	11.707
lnpfdi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对数	249	3.587	2.494	-4.754	7.054
frevenueatio	预算内收入占 GDP 比重	249	0.072	0.032	0.013	0.230
fexpenditureratio	预算内支出占 GDP 比重	249	0.158	0.082	0.033	0.645

当然,不存在逆因果问题不代表对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就一定是一致的,有些变量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并且又与核心解释变量 culture 相关,如果这些变量没有包括进模型,仍然会造成 culture 的系数估计的偏误,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依然存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我们加入了很多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首先是每个城市是否在历史上作过全国性政治中心(oncapital)、区域性政治中心(opcapital),这些城市往往存在一些地理、人文方面的发展优势,从而这两个虚拟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某些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可观测因素。与省会使用方言不同的地区有很多是离省会较远的城市,而较远的距离会提高运输成本,同样会减少贸易往来和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还控制了距省会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lndiscapital)。虽然几乎每个省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都是省会,但有不少地区离自己省会很远,离其他省的省会或大城市却很近,而离最近大城市的距离同样会影响贸易和经济,因此我们又控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lndiscapital)。本文大城市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口或 GDP 指标,因为那样会使大城市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中西部会很少,从而不能考虑到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文定义的大城市是指所有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比如贵阳、银川,如果按全国统一的标准只能算作中等偏大的城市,但是它们也是当地的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有重要影响,因此按照我们的标准把它们也界定为大城市是很合理的。

在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划研究中有一些文献认为各省交界地区由于归属不

清, 各省都不愿在这些地方进行投资, 造成发展落后(刘君德和舒庆, 1996)<sup>32</sup>, 而我们的样本中有很多被分割出区域文化的城市也位于各省边界地区, 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高估文化差异的影响, 我们也控制了是否位于省际边界地区(bordercity)这个虚拟变量。此外, 有些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地区位于山区中, 山区地形本身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不能将其归因到文化差异中去, 所以模型也控制了每个地级市的平均海拔(elemean)和海拔标准差(elestd)。和其他研究区域经济的文献类似, 我们也控制了距最近大型海港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lndisbigport), 是否有大型海港(seaport), 是否有大型河港(riverport), 纬度(latitude), 市辖区行政区域面积的自然对数(lnarea)以及交通、气候等其他因素。之所以全部选择直线距离而不是实际交通距离, 一是因为不同交通方式的距离不同, 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统一标准。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交通距离是一个内生性很高的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往往首先拥有直接通往省会和附近大城市的公路、铁路, 而发展落后的地区则通常要绕道才能到达, 从而增加了交通距离, 因此我们使用了统一的外生的直线距离标准。此外, 我们还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天然的发展条件、区域发展政策等各省之间不同但省内相同或变化很小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数据来源见表2。

表2 原始数据来源

变量名	数据来源
人均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 2011)
区域文化分布	中国区域文化文献
方言分布	方言文献
各省地方保护水平	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中国企业家队伍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地理、气候数据	中国时间序列行政区域GIS数据 由社会经济学数据和应用中心(CIESIN)、中国测量与制图学院(SASM)和中国时间空间(SITAS)(Washington University)联合开发
划入当前所在省历史长度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5、6、7册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
距大型海港直线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2010)》
距省会直线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2010)》
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2010)》
铁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2010)》
国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2010)》
高速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2010)》
国内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 2011)
国内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 2011)

<sup>32</sup> 刘君德、舒庆, “中国区域经济的视角——行政区经济”, 《改革与战略》, 1996年第5期, 第1—4页。

(续表)

变量名	数据来源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1)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1)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1)

## 五、省内文化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

### (一) 基本结果

首先来看存在省际地方保护的情况下省内文化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估计结果在表 3 中。第一列是最简单的基本模型，整体来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城市人均 GDP 会低约 14.9%，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角度看，文化差异都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控制变量中曾经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城市(洛阳、开封等)人均 GDP 高出其他城市约 30.9%，而是否曾经是地方性政治中心对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作用。拥有大型海港和河港的城市人均 GDP 明显更高，分别比其他城市高出约 20.5% 和 48.8%。之所以出现河港比海港更重要的结果，是因为已经控制了距离大型海港直线距离、省份固定效应等因素，它们会吸收掉很多大型海港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并且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之后距大型海港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这一变量也不显著，这是因为在一个省内部，特别是内陆省份，距离海洋更近并没有太多的优势。纬度、平均气温、平均降水以及它们的标准差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来看都对人均 GDP 都没有什么明显作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相比于农业，现代工商业对气温、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依赖是非常小的。市辖区行政区域面积与人均 GDP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经济意义很小，市辖区行政区域面积增加 10%，人均 GDP 降低约 0.7%，这种负相关可能是因为经济落后的城市地价更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扩张过度造成的，而不应理解为因果关系。距省会直线距离对城市经济表现有负面作用，距离每增加 10% 人均 GDP 下降约 0.6%，效果不是很大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说明省会虽然是每个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每个城市并不一定就必须要和省会这一个城市进行经济分工和贸易往来，从而距省会直线距离的作用也不是特别大。

表3 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

	(1)	(2)	(3)	(4)	(5)
	lnpgdp	lnpgdp	lnpgdp	lnpgdp	lnpgdp
culture	-0.149*	-0.142*	-0.151*	-0.158*	-0.154*
	(0.080)	(0.084)	(0.086)	(0.087)	(0.086)
oncapital	0.309*	0.286*	0.316*	0.299*	0.255
	(0.16)	(0.16)	(0.16)	(0.17)	(0.16)
opcapital	-0.00701	-0.0309	-0.0346	-0.0387	-0.00533
	(0.14)	(0.14)	(0.15)	(0.15)	(0.14)
latitude	0.0648	0.0626	0.120**	0.118**	0.122**
	(0.052)	(0.052)	(0.055)	(0.056)	(0.056)
seaport	0.205*	0.262**	0.302**	0.314***	0.326***
	(0.11)	(0.12)	(0.12)	(0.12)	(0.11)
riverport	0.488***	0.512***	0.533***	0.520***	0.489***
	(0.13)	(0.13)	(0.13)	(0.13)	(0.13)
lndisbigport	0.0536	0.0493	0.0612	0.0599	0.0653
	(0.040)	(0.040)	(0.042)	(0.044)	(0.041)
tempemean	0.00304	0.00218	0.00983	0.00978	0.0101
	(0.0054)	(0.0056)	(0.0068)	(0.0068)	(0.0066)
tempestd	0.00381	0.00344	0.0153	0.0133	0.0135
	(0.012)	(0.012)	(0.014)	(0.014)	(0.014)
precimean	0.0387	0.0669	0.268	0.273	0.236
	(0.23)	(0.23)	(0.22)	(0.23)	(0.22)
precistd	-0.515	-0.483	-0.466	-0.301	-0.272
	(1.43)	(1.42)	(1.34)	(1.36)	(1.38)
lnarea	-0.0729**	-0.0750**	-0.0709**	-0.0716**	-0.0709**
	(0.034)	(0.034)	(0.034)	(0.034)	(0.034)
lndiscapital	-0.0621	-0.0446	-0.0223	-0.0375	0.228**
	(0.060)	(0.062)	(0.060)	(0.061)	(0.096)
rail		0.0505	0.0533	0.0518	0.0559*
		(0.032)	(0.033)	(0.033)	(0.033)
nationroad		-0.00422	-0.00456	-0.00994	-0.0245
		(0.028)	(0.029)	(0.029)	(0.028)
highway		0.0265	0.0298	0.0284	0.0372
		(0.029)	(0.030)	(0.030)	(0.030)
elemean			0.0573*	0.0563*	0.0613*
			(0.033)	(0.033)	(0.031)
elestd			-0.126*	-0.123	-0.115
			(0.075)	(0.075)	(0.073)
bordercity				0.0814	0.119
				(0.081)	(0.080)

(续表)

	(1)	(2)	(3)	(4)	(5)
	lnpgdp	lnpgdp	lnpgdp	lnpgdp	lnpgdp
Indisbigcity					-0.357*** (0.11)
Observations	249	249	249	249	249
R-squared	0.38	0.39	0.41	0.41	0.43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程度上显著。

### (二) 稳健性分析

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些被分割的地区由于地理阻断造成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而不是文化本身产生的影响，因此表 3 第二列考虑了交通因素的作用，我们计算了每个城市在铁路(rail)、国道(nationroad)和高速公路(highway)方面分别有多少条射线通往其他地级或以上城市。结果显示国道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没有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国道覆盖范围很广，几乎每个地级城市都有国道穿过，使得该变量在不同观测间变异很小。而城市每多一条铁路射线通往其他地级或以上城市，人均 GDP 提高 5%，每多一条高速公路射线，人均 GDP 增加约 2.7%，但两者在 10% 水平上都不显著，原因应该是三种交通基础设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导致估计出的系数标准误较大，铁路和高速公路的相关系数为 0.30，它们与国道的相关系数都是 0.23。为了更直接地检验地形的影响，第三列中又加入了反映地形因素的变量——海拔平均值和海拔标准差，考虑地形之后文化差异的系数变化很小而且绝对值更大了，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城市人均 GDP 比其他城市低 15.1%，这说明是否与本省主流文化存在文化差异与山区地形并没有必然关系，而是行政区划人为划分的结果，文化差异与海拔平均值和标准差相关系数都不到 0.1。一般认为海拔越高、标准差越大的地方越可能是山区，海拔标准差大表明地形凹凸不平不利于发展经济，结果支持了这一点，标准差增加 100 米人均 GDP 会下降约 12%。但是控制海拔标准差、省份固定效应和其他因素的情形下，海拔平均值还对经济表现有略微正面作用，每提高 100 米人均 GDP 增加约 6%，这可能是由于很多高海拔城市矿产资源丰富<sup>33</sup>。

为了控制省际边界效应的影响，第四列加入了边界城市虚拟变量，它与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差异确实存在约 0.17 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相关性不强而且边界效应本身也很小，所以文化差异的系数并没有明显变化。之所以不存在明显为负的边界效应是因为这种负面作用可能更多地体现在边界县级政区在各省之间归属不清的情形中，而除了海南建省和重庆直辖这两个特殊例子

<sup>33</sup> 由于矿产资源储量只有省级数据，所有模型又已经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因此无法直接检验这个解释。

之外,20世纪50年代初行政区划调整完毕后直到现在从未发生过一个地级市被整个划分到相邻省份的先例,因此可以预期没有哪一任省级领导会仅仅因为这个因素不愿在某个地级城市投资<sup>34</sup>。第五列考虑了距最近大城市距离这个因素,前文已提及不少城市附近的大城市并不是自己所在省的省会,这些大城市有些是本省的副省级城市,如深圳、厦门、青岛等,到这些最近城市的距离也许比到省会的距离对经济影响更大。另外即使附近大城市属另外一个省,如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离哈尔滨很近,而离通辽最近的大城市是长春,比呼和浩特近很多,只要邻省地方保护不是太强,距最近大城市的直线距离也可能比距省会的直线距离更重要,而结果支持了这种假说,距最近大城市距离每增加10%,人均GDP会下降约3.6%,其效果远大于距省会直线距离的影响。但由于该变量与文化差异并没有必然关系,我们关注的文化差异的系数估计值仍然很稳健没有显著变动。综合表3的结果,在加入各种控制变量之后文化差异的影响都是相当稳健的,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持,省级行政区划对文化分布的分割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对被分割地区的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文化的演变是缓慢的,文化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长期持续的。前文仅使用2009年和2010年两年GDP平均值衡量每个城市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得出的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为了检验这些结果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否依然成立,我们还考察了文化分割对各城市1995—2008年另外14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减少特定年份统计误差的影响,我们同样使用每两年一次的平均值进行分析,结果在表4中。估计模型为表3第五列的基本模型,使用1995—2008年每两年一次的人均GDP平均值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表4的结果显示文化分割对被分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负面作用是长期持续的,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比主流文化地区低15%—20%<sup>35</sup>。

表4 文化差异的长期作用

	(1)	(2)	(3)	(4)	(5)	(6)	(7)
	1995—1996	1997—1998	1999—2000	2001—2002	2003—2004	2005—2006	2007—2008
culture	-0.203**	-0.135	-0.165*	-0.159*	-0.190**	-0.157*	-0.164*
	(0.081)	(0.09)	(0.09)	(0.09)	(0.092)	(0.09)	(0.09)

<sup>34</sup> 周黎安和陶婧(2011)在控制了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后,发现省界上县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非省界地区,并将这一结果主要解释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不利于不同省在省界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周黎安和陶婧(2011)并不矛盾,因为本文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的数据,这些市辖区绝大多数本身并不处于省界上,只是所属的地级市与其他省相邻,按照周黎安和陶婧(2011)的研究标准,我们数据中处于省界的这些地级市市辖区基本上都不处于省界上,而是每个省的境内。

<sup>35</sup> 只有1997年和1998年两年平均值的结果在10%水平上不显著,不过仍然有13.5%的负面作用,这两年数据的系数估计值与其他年份相差较多且不显著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样本缺失较多,样本量只有191,因为很多当时还是县级市的城市在这两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没有统计人口,无法计算人均GDP。

(续表)

	(1)	(2)	(3)	(4)	(5)	(6)	(7)
	1995—1996	1997—1998	1999—2000	2001—2002	2003—2004	2005—2006	2007—2008
Observations	224	191	225	241	249	249	249
R-squared	0.49	0.43	0.48	0.46	0.46	0.42	0.43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表 3 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 (三) 机制解释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文化分割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稳健的负相关性。对这些实证结果，我们的诠释是邻省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内文化差异相结合提高了被分割地区的贸易成本，从而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并且属于同一省级行政区历史的长度会通过文化同化减弱这种负面影响。下面我们直接研究以上影响机制是否成立，从而可以更好地将我们前文的发现解释为文化差异影响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 1. 地方保护主义与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前文理论部分已经阐明省级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破并不必然导致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提高了省际贸易成本，使得被分割城市不能自由地选择经济合作伙伴，从而被迫更多地与省内其他文化的城市进行省内贸易往来。由此得出推论 1：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将随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我们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2 年进行的“中国企业家队伍调查”的数据计算了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指数。具体而言，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是“请列出您尝试向其他省份销售商品时受到行政约束最多的 5 个省”，每个省被列出一次记 1 分。首先我们将每个省的得分进行加总，然后考虑到经济规模越大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我们将每个省的得分再除以该省的 GDP 总量进行了标准化，从而得出每个省的地方保护主义指数。

表 5 给出我们检验这一推论的实证结果，其中第一列仍然是复制表 3 最后一列的基本结果<sup>36</sup>，而在第二列中同时加入了文化差异、邻省地方保护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交叉项。第二列中文化差异自身的系数为 0.05 且不显著，表明在控制了邻省地方保护水平后文化差异自身不再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考虑交叉项后，如果邻省是样本中地方保护水平最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指数为 0.012)，则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到 1%，可以认为对人均 GDP 没有什么作用。而如果相邻的省份是地方保护水平最高的河南省(指数高达 0.088)，那么文化差异的影响将是 40.8%，远高于之前估计的平均水平。另

<sup>36</sup> 后续结果使用的模型都是表 3 最后一列控制了最多其他因素的模型，为了节约篇幅不再报告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误。

外,对于持主流文化的城市,邻省地方保护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017)人均GDP会下降12.3%,但是对于与主流文化不同的被分割城市,这个影响会增大到21.3%。这一结果说明省级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分割与严重的地方保护结合时将会对被分割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负面作用,也为推论1提供了支持。

表5 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作用

	(1)	(2)	(3)	(4)	(5)	(6)
			邻省地方 保护较强	邻省地方 保护较弱	沿海省份	内陆省份
culture	-0.154*	0.0539	-0.176	-0.0609	-0.0467	-0.232**
	(0.086)	(0.16)	(0.11)	(0.16)	(0.12)	(0.11)
culture× protection		-5.252				
		(3.69)				
protection		-7.245***				
		(2.41)				
观测值	249	249	133	116	97	152
R-squared	0.43	0.48	0.57	0.61	0.49	0.39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表3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可能由于文化差异和交叉项的相关性较高,上述结果中交叉项的 $t$ 值只有1.4,在统计意义上不是很显著。为了进一步检验推论1,按照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中位数0.032,将全样本分成两组并分别估计文化差异的作用。第三列的结果显示,对于邻省地方保护更强的城市,文化差异的作用是使人均GDP降低17.6%(且接近统计显著水平),高于全部样本估计出的影响15.4%,而第四列表明在邻省地方保护较弱的城市中,文化差异仅有6.1%的不显著影响。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检验这两个系数之间的差异是否在统计上显著,但至少从侧面支持了推论1,即省内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将随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提高而加剧。之前大多数关于地方保护影响区域经济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每个省地方保护水平对自身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较少地研究对邻省的作用,更没有关注地方保护与文化差异相结合所发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是对此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另一个影响地区贸易机会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是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因为我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国际贸易机会方面差别很大,而国际贸易机会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因此另一个研究文化差异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的角度,是探讨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分割在沿海和内地产生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差别的程度又有多大。如果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省际贸易,从而使得省内文化差异损害了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拥有更多国际贸易机会的沿海地区受省级贸易壁垒的影响会少,文化分割的负面作用也会小很多。

据此，我们将研究样本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组子样本，前者包括从辽宁、河北一直到广西的普通地级城市的市辖区，其他城市被划为内地样本。表 5 第五列和第六列分别是沿海样本和内陆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和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沿海地区文化差异对人均 GDP 只有 4.7% 的影响而且不显著，而在内陆省份被分割城市的人均 GDP 比其他城市低约 23.2%，且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本文发现的 15% 左右的平均负面影响几乎全部来自内陆地区，在国际贸易机会更多的沿海地区，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小。典型的例子是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城市，它们属于吴越文化，那里的人们说吴语，却被人多地划分到江苏省。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说，如果相邻的同属吴越文化的浙江省和上海市实行地方保护主义<sup>37</sup>，苏、锡、常三市的经济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但由于处于沿海地区又毗邻长江，外向型经济十分发达，这里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均 GDP 与北京、上海相当。假如这三个城市处于内陆又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这样的经济表现则可能不会出现。

以上分析支持了我们的机制解释，也即文化差异起作用的基础是省级行政区划打破文化布局和严重的地方保护同时存在，被分割城市与本省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和与邻省持相同区域文化的城市之间的地方保护壁垒使得它们无论与哪一边进行经济往来贸易成本都更高，从而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如果各省都不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每个地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贸易伙伴和合作对象，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增长；另外如果省级行政区划能够更多地考虑各区域文化的布局而不是随意地人为划分，省内文化差异出现的可能也会大大减少。而我们发现的现实状况却是不合理的省级行政区划和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市场分割相结合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经济损失。

## 2. 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长度与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虽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要比正式制度的变革慢得多，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度应该足以产生文化演进和同化。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划分的省级行政区划，被划入同一省的地区之间肯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往来更多，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省会城市更是这些交往的轴心，成百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也足以在其中起到文化同化的作用。如果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可以预期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城市如果被划入当前省份的时间更长，由此产生的文化同化作用会削弱文化差异与邻省地方保护相结合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反，如果一个城市是较晚被分割出去划入其他省份的，文化差异的作用就会更大。这就是前文推论 2 所要表达的含义。根据语言和区域文化的研究文献，我国当前的方

<sup>37</sup> 在我们的数据中浙江省地方保护水平处于中间位置，而上海市仅次于河南省是保护水平第二高的省级行政区。

言和区域文化分布格局早在宋代就已形成,所以本文对历史长度的测度从北宋开始。<sup>38</sup> 具体而言我们计算了北宋至今每个样本中的普通地级城市与当前省会属于同一省级行政区的历史长度<sup>39</sup>,这个变量最大值是1049年,即从北宋建国到2010年一直属于一个行政区,最小是61年,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划入当前所在省。

验证推论2的分析结果在表6中给出,第一列依旧是复制表3第五列的基本结果以便其他结果与之进行比较,在第二列中同时加入了文化差异,历史长度及二者的交叉项,正的交叉项说明历史长度的提高可以减弱文化异质的影响。由于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导致的共线性问题,三个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因此我们继续采用了分样本的处理方法。首先将全样本按照历史长度的中位数784年分成两组,分别考察省内文化异质的影响。从第三列和第四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被划入当前所在省历史较长的城市,文化异质的影响较小,人均GDP比不存在文化异质的城市低10.9%,且不显著。而对于被划入当前省历史长度较短的城市,文化异质的影响高达23.8%,并在10%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意味着,我们在前文发现的文化异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果,更多地是由较晚才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城市导致的。虽然不能直接检验两个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推论2。更长的历史长度产生的文化同化可以减弱文化隔断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我们对于前文发现所做的诠释,也即文化差异引起的非正式制度冲突和不信任提高了贸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发展,而不是主要由其他遗漏变量导致的结果。

表6 划入当前省份历史长度的影响

	(1)	(2)	(3)	(4)
			历史长度 大于784年	历史长度 小于784年
culture	-0.154*	-0.262	-0.109	-0.238*
	(0.086)	(0.27)	(0.11)	(0.13)
culture×		0.000138		
history length		(0.00031)		
history length		-0.000259		
		(0.00025)		
观测值	249	249	125	124
R-squared	0.43	0.44	0.63	0.47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表3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sup>38</sup> 虽然前文曾强调唐朝和宋朝的行政区划主要以山川河流为依据,尊重了人文地理单元的天然布局,但是也不可能与区域文化分布完全一致,也有不少区域文化被分割的情况,只是元朝及以后这种打乱和分割要严重得多。

<sup>39</sup> 历代行政区划资料来自张明庚和张明聚(1996)。张明庚、张明聚,《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公元前221年—公元1991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四) 其他可能解释

上文中发现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我们通过更多的计量分析来讨论这些另外的解释，并与我们之前提出的关于文化差异提高交易成本且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损害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假说进行比较。这些分析的结果在表 7 和表 8 中给出，其中表 7 和表 8 中的第一列依旧均为复制表 3 第五列的基本结果以便其他结果与之比较。

表 7 考察地理屏障因素和剔除四省的结果

	(1)	(2)	(3)
			剔除江苏、安徽、河南、河北
culture	-0.154* (0.086)	-0.151* (0.087)	-0.180 (0.11)
Indiscapital	0.228** (0.096)	0.167 (0.102)	0.188** (0.091)
Indisbigcity	-0.357*** (0.11)	-0.220* (0.119)	-0.300*** (0.11)
ticcapital		0.001 (0.001)	
tickbigcity		-0.003** (0.001)	
观测值	249	249	194
R-squared	0.43	0.44	0.44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表 3 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表 8 投资和财政结果

因变量	(1)	(2)	(3)	(4)	(5)	(6)	(7)
	人均 GDP	人均 GDP	人均国内非 房地产投资	人均国内非 住宅投资	人均外商 直接投资	预算内收入 占 GDP 比例	预算内支出 占 GDP 比例
culture	-0.154* (0.086)	-0.137 (0.084)	-0.122 (0.092)	-0.119 (0.092)	0.576** (0.24)	0.00227 (0.0045)	0.0158 (0.012)
comratio		-0.219 (0.215)					
观测值	249	249	249	249	249	249	249
R-squared	0.43	0.44	0.35	0.35	0.71	0.39	0.37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表 3 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1. 文化还是地理

唐宋两代的行政区划主要是以山川河流为依据，元朝及之后的省级行政

区划不但没有尊重区域文化的布局,还打破了天然的地理单元,省内不但广泛存在区域文化的差异而且还有长江、黄河、秦岭等大型地理屏障。但本文的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考虑大型地理屏障和地理单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是因为没有衡量地理单元的统一标准,虽然有长江、黄河、淮河、秦岭等少数大型天然地理屏障,但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对每个省、每个城市都去度量哪些城市与省会城市属于同一地理单元,哪些城市又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相比较而言,对区域文化的衡量更为可行,因为一般省会城市所属的区域文化和使用的方言都是该省大多数人口持有的文化和方言,且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是每个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省会文化可以代表每个省的主流文化,也很容易度量其他普通地级城市是否也属于这个主流文化圈。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加入每个城市到达省会城市的汽车票价(tickcapital)和到达最近大城市的汽车票价(tickbigcity)这两个交通成本变量来间接考察山川河流等地理屏障通过交通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选择汽车票,是因为汽车票价由本地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能够反映实际的运输成本,如隧道通行费、过桥费、环山绕行的额外费用等都会加到汽车票价中,这些都能很好地反映两地间是否有天然地理屏障。而火车票基本由铁路管理部门统一按里程定价,很少考虑个别地区的地理状况。民航的定价也有相同的问题,而且主要取决于直线距离的长短,不反映地理状况,更重要的是省内交通依靠民航的情况是很少的,特别是省会周边较近的城市。

表7第二列的结果表明加入了两个交通成本新变量后文化差异的系数估计值只有略微减少并且依然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到达省会的汽车票价没有明显作用,而到达最近大城市的汽车票价则显著为负,它吸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的影响,后者的系数估计值减少很多。综上可以认为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已经控制直线距离和交通费用之后所发现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关系不大可能是天然地理屏障等地理因素造成的,而是文化差异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损害了区域经济发展。

## 2. 文化还是语言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文化异质,而是否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具体测量方式是每个城市所使用的方言与省会使用的方言是否属于同一个大类。因此,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到底是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文化因素的差别还是语言本身的不同造成了前文所发现的稳健的结果? Guiso *et al.* (2009) 在研究欧盟国家之间文化差异对国际间信任、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时重点讨论了“文化效应”和“信息效应”,文化效应即文化差异产生的不信任和非正式制度冲突所带来的影响,而信息效应是两国间纯粹因为语言不通而对跨国贸易和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于国际间的语言障碍,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语言障碍是很小的。归功于新中国建立多年来的普通话和基础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大部分中年人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能较熟

练地掌握普通话，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即使家乡方言完全不同也可以使用普通话这一工具进行很好的交流，因此方言本身差别带来的“信息效应”并不重要。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同化则不可能这么快地完成，“文化效应”仍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中国北方方言内部一致性较高，即使都说各自的方言，从东北、华北到西北广大地区的人们都可以互相通话，而南方方言内部高度的差异经常使得相邻两个县的人都无法使用方言进行交流。假如主要是方言本身在交流过程中的角色在起作用，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地级市级别的方言差异并不重要，因为假设所有人都使用各自家乡的方言，北方跨语言大类也可以交流，而南方跨小片就难以交流，更不用说跨片或跨语言大类。因此地级市之间方言是否属于同一大类根本不重要，只有在江苏、安徽、河南和湖北这种横跨南北的省份，省内大类方言差异才起作用。为了检验这一假说，表 7 第三列是剔除了这四个省之后的结果，可以发现省内文化差异的影响其实比全样本更大了，对人均 GDP 有约 18% 的负面作用，虽然在 10% 水平上不显著，但  $p$  值只有 0.106，非常接近传统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前文发现的省内文化异质与地方保护相结合对被分割城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应该是由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方言本身的障碍导致的。

### 3. 文化还是政治因素

对本文基本结果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这些被分割的城市由于不属于所在省的主流文化，政治地位比较低，从而在省级经济、投资和财政政策中受到了歧视，遭到不公正待遇，同样可以使得这些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但这不能解释为是文化差异和贸易成本增加导致的。

为了检验这种假说是否成立，我们首先在省内不同地区文化数目超过一个的 17 个省中，计算了本届省委常委成员来自非主流文化地区的比例。在去除籍贯是外省和本省省会的官员之后，来自非主流文化地区的官员占 50.5%，即使包括进籍贯是省会城市的官员，这一比例也高达 44.3%，与 50% 没有显著性差别。另外考虑到非主流文化地区的城市数量和人口数量都低于 50%，所以在省委常委成员中这些地区其实还稍占优势，至少没有遭到歧视。另外，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还加入了来自每个城市的常委成员占省委常委的比例 (comratio)，表 8 第二列显示这一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不显著，并且与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分割略有正相关关系，说明并不是文化分割地区的官员在晋升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在省委常委中代表性较低进而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低。

接下来我们进行投资和财政方面的比较。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房地产投资(其中还可以区分出住宅投资)和其他国内投资三个部分。表 8 第二列和第三列结果表明省内文化异质使人均国内非房地产投资减少约 12.2%，使人均国内非住宅投资减少 11.9%，

但是两个系数在 10% 水平上都不显著。而第四列表明被分割城市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要高出 57.6%，这说明在中外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下省内文化的异同对外资显然是不重要的，外资可能正是利用了内资因为文化异质而留出的投资空缺。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文化异质对被分割城市的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在投资项目上的重要地位，这些结果不能支持政府投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了被分割城市发展落后的论点。利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和支出分别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每个城市的财政负担比，第五列和第六列的结果表明文化异质对被分割城市的财政负担比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即没有发现这些城市在省内财政资源分配中受到歧视，所以认为是财政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了被分割城市发展落后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一个从政治角度出发的解释是元朝及以后的朝代主要是从政治稳定角度考虑划分省级政区的，因此有些被分割地区可能历来反抗中央统治的倾向就比较强烈，同时这些地方正好又是自然环境恶劣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区，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的数量关系就不能解释为是文化差异阻碍了经济发展，而是这些地区先天不利于经济活动而恰巧又因为政治原因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到了其他省份。针对这一疑虑，我们的解释有两点，一是前文机制解释部分已经说明邻省地方保护水平下降或者更长的历史产生的文化同化都可以减轻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机制支持了文化差异通过非正式制度冲突和不信任提高贸易成本进而损害经济发展的假说，而如果被分割地区因为先天非人为的因素导致经济落后，那么这些机制就不会成立。另一方面，前文稳健性分析部分已经表明在控制了山区因素以后文化差异的影响几乎没有变化，虽然山区因素本身确实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它与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差异没有必然相关性，也许“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说法成立，但是被省级政区分割出所属文化的地区并不主要是这些地方。

## 六、结论和政策讨论

基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割据的担忧，自元朝开始我国一级行政区划不再遵循山川河流等大型地理屏障，人文地理单元被打破，区域文化分布也被严重打乱。很多持不同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迥异的地区被人为随意地划分到同一个省中，造成每个省内部都分布着多种区域文化，而同一个区域内的城市则被分割到两个甚至多个省之中。其中省会城市代表的文化一般都是该省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持有的文化，被视为每个省的主流文化，而被人为划入这个省的其他文化的地区则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种省内文化差异在农业社会或政府干预很少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对区域经济都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当前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

权的治理体制下，每个省都面临强烈的激励来使用各种手段维护本地的相对经济优势，甚至与邻省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导致全国大市场被分割成很多个省内小市场。即使加入 WTO 之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已经高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是只要地方政府维护本地经济增长的强激励存在，省际贸易成本就一定高于省内贸易成本，不管这种更高的成本来自行政、司法、财政还是其他方面。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被分割出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到其他省份的城市与本省其他城市贸易时，因为文化差异产生的不信任和非正式制度冲突提高了交易成本，与持有相同文化的邻省城市间又存在更高的省际贸易成本，经济合作和贸易来往受到限制从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本文的研究支持了以上理论预期，与本省主流文化存在异质的城市的人均 GDP 确实显著低于其他城市，并且邻省地方保护水平越高时这种文化差异的负面作用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文化同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省内文化异质的负面影响，被分割城市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越长受到的文化异质的限制就越小。针对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体制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改革，从而地方保护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的现状，比较理性的政策启示应该是，局部的边际的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更多地考虑文化传统因素，以尽量使区域文化接近的地区更多地被划入同一个行政区，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文化差异和地方保护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损失。

## 参 考 文 献

- [1] Alesina, A., and P.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forthcoming, 2014.
- [2] Axelrod, 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3] Bai, C., Z. Tao, and S. Tong, "Bureaucrat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2), 308—319.
- [4] Barkema, H. G., J. H. J. Bell, and J. M. E. Pennings, "Foreign Entry, Cultural Barriers and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2), 151—166.
- [5] Beugelsdijk, S., and R. Maseland, *Culture in Economics: History,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an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Bjørnskov, C., "Social Trust and the Growth of Schooling",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9, 28, 249—257.
- [7] Buchner, S., L. G. Gonzalez, W. Guth, and M. V. Levati, "Incentive Contracts versus Trust in Three Person Ultimatum Gam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20, 673—694.
- [8] Chen, J., *GeoChina: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Character of National Geographic*. Beijing: China Archive Press, 1998. (in Chinese)
- [9] Delhey, J., and K. Newton, "Predicting Cross-national Levels of Social Trust: Global Pattern of Nordic Exceptionalism?",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21(4), 311—327.

- [10] Jin, T.,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Nanjing: Nanjing Norm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 Chinese)
- [11] Jin, T., and Y. Wang, "Systematic Thoughts on Current Provincial Leve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form",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6, 1, 10—15. (in Chinese)
- [12] Gao, X.,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Cross-jurisdiction Wate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akes and Reservoirs", *China Economic Studies*, 2014, 4, 21—29. (in Chinese)
- [13] Gambetta, 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8.
- [14] Gong, Y., I. H. Chow, and D. Ahlstrom, "Cultural Diversity in China: Dialect, Job Embeddedness, and Turnov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28, 221—238.
- [15]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3), 1095—1131.
- [16]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0.
- [17] Knack, S., and P.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 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251—1288.
- [18] Knack, S., "Groups, Growth and Trust: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e Olson and Putnam Hypotheses", *Public Choice*, 2003, 117, 341—355.
- [19] Law, M. T., Y. Li, and C. Long, "Local Government Autonomy and C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2015, Memo. (in Chinese)
- [20] Li, J., K. Lam, and G. Qian, "Does Culture Affect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of Firms? The Case of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1), 115—131.
- [21] Li, D., *China Regional Culture*. Taiyuan: Shanxi Advanced Education United Press, 1995. (in Chinese)
- [22] Liu, J., R. Jin, and K. Zhou,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Geography*.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9. (in Chinese)
- [23] Liu, J., and Q. Shu,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Regional Econom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conomy", *Reform and Strategy*, 1996, 5, 1—4. (in Chinese)
- [24] Long, X., and J. Wang, "Local Judicial Protectionism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People's Supreme Court IP Cases", *China Economic Studies*, 2014, 3, 3—18. (in Chinese)
- [25] Lu, M., and Z. Chen, "Economic Growth under Market Fragmenta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3, 42—52. (in Chinese)
- [26] Luo, Y., and M. Peng, "Learning to Compet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xperienc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 (2), 269—295.
- [27] Mezas, J. M., "Identifying Liabilities of Foreignness and Strategies to Minimize Their Effects: The Case of Labor Lawsuit Judg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3), 229—244.
- [28] 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9] North, 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1), 97—112.
- [30] Ostrom, E., and J. Walker,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rom Experimental Research*.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3.

- [31] Pan, Z., H. Yin, and M. Lu,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s on Performance of Foreign Firms", *Management World*, 2008, 7, 103—115. (in Chinese)
- [32] Park, S. H., and G. R. Ungson,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on Joint Venture Dissol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2), 279—307.
- [33] Paxton, P.,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5(1), 88—127.
- [34] Poncet, S., "Domestic 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2003, mimeo.
- [35] Poncet, S.,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13(3), 409—430.
- [36] Qian, Y., and G.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 1143—1162.
- [37] Roland, G.,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Fast-moving and Slow-moving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38(4), 109—131.
- [38] Shen, L., and Y. Dai, "The Formation, Shortcomings and Source of China's Governors Econom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990, 3, 12—19. (in Chinese)
- [39] Shi, Y., and L. Zhou,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1, 17—28. (in Chinese)
- [40] Wang, E., *China Cultural Geograph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in Chinese)
- [41] Wang, M., Q. Huang, and L. Ding, "The Effect of Reg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Moving Back of Long Distance Reservoir Migrants", *Population and Economy*, 1999, 1, 43—47. (in Chinese)
- [42] Wang, X., and H. Ni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Management World*, 2010, 4, 42—53. (in Chinese)
- [43] Xie, B., and Y. Wu, "Analyses of Some Problems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nqing Normal College (Social Science)*, 2004, 1, 13—17. (in Chinese)
- [44] Yan, Y., *Introduction to Wu Dialect*.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4. (in Chinese)
- [45] Young, A.,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1091—1135.
- [46] Zhan, B., *Chinese Dialects and Dialect Survey*.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1991. (in Chinese)
- [47] Zhan, B.,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Problems of Dialects Division", *Dialect*, 2002, 4, 344—352. (in Chinese)
- [48] Zhang, M., and M. Zha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inese Dynasties: 221 B. C—1991 A. D.* Beijing: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ress, 1996. (in Chinese)
- [49] Zak, P. J., and S. Knack,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295—321.
- [50] Zhang, W., and J. Ma, "Property Right Basis of Vicious Competi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999, 6, 11—20. (in Chinese)
- [51] Zerfu, D., P. Zikhali, and I. Kabenga, "Does Ethnicity Matter for Trust? Evidence from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9, 18 (1), 153—175.
- [52] Zhou, L., "Stimulus an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Promotion Gam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4, 6, 33—40. (in Chinese)
- [53] Zhou, L., "Research on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rn among Chinese Local Official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7, 36—50. (in Chinese)

[54] Zhou, Z. , and R. You, *Dialects and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People's Press of Shanghai, 1986. (in Chinese)

[55] Zhu, J. *Dialects and Culture*.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in Chinese)

## Does Cultural Segmentation Caused b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Harm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

XIANG GA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HERYL XIAONING LONG\*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Current province-leve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China breaks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many cities are separated from their local culture region to locate in other provinces. These cities encounter potential cultural conflicts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provinces they belong to, and also face various local protectionism barriers with neighboring cities in the province that share the same border and local culture with them. As a result, transaction costs could be higher for them whichever side they trade with, leading to potential harm to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dialect as a proxy for local culture, we find that intra-provincial cultural differences caus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segmen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lower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eparated cities.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aggravated by greater local protectionism in neighbor provinces but alleviated by a longer history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cultural segmentation caused b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local protectionism work together to bring about substantial economic loss.

**Key Words** cultural segmentati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alect

**JEL Classification** O43, R58, H70

---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ryl Xiaoning Long,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422 Siming South Road,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Tel: 86-592-2182075; E-mail: cxlong@xmu.edu.cn